

# 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

王铭铭

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对文化变迁理论的思考,它概括了一些原来各自分立的理论,力图把它们综合起来,提出一个新的看法。我想要讨论的问题有二:其一,社会人类学者如何处理自己的研究与时代支配性话语现代化理论的关系;其二,我们如何更加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化变迁。这一讨论的主要关注点是社会人类学的文化思考,但所涉及的问题与民俗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均有密切的相关性。

## 一、文化变迁

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引起社会人文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十分强调对人、社会、文化本质的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对于变迁的世界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看法。在学科初创之时,社会人类学者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许诺,他们声称自己正在拯救受全球化危害的文化和族群,也正在为剧烈变动的人、社会、文化重建其人文的基本形式。同时,他们意识到变迁难以避免,因而把大量注意力放在“文化变迁”(culture change)的研究上,力图在理解人文类型的原有格局前提下为社会—文化转型提供合理的解释。

在研究变迁的过程中,社会人类学者当然也注意到环境发生变化所引起的社会—文化体系变化。尤其是对于人类生态学者来说,人与自然互动方式潜在着强大的动力,其对社会人文体系的作用十分重要。不过,现代社会人类学是创立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功能主义的理论倾向于把各种亲属与婚姻、政治体系、经济组织、宗教信仰等等看成是紧密配合、形成一体化的文化或社会的结构体系,因此社会人类学者经常把所研究的社会—文化单位看成稳定的整体,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人类学学派,都更多地吧社会—文化的动力归结为简单的外来的大规模冲击。

传统上,在解释变迁过程或途径时,社会人类学者最常运用的概念包括:传播(diffusion)、文化丧失(cultural loss)、涵化(acculturation)以及发明(innovation)。所谓“传播”指的就是文化形式的借用或流传过程中出现文化变动。传播往往有中介,其主体就是从另一社会引进新的文化因素的个人或群体。鉴于借用(borrowing)现象的普遍性,马林诺

























同等重要地，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传媒时代也是文化多元化、意义多重化以及对话渠道多样化的时代。霍尔（Stuart Hall）认为，传媒是现代文化符号编码（encoding）的工具。<sup>①</sup>事实上，虽然支配性的力量可以通过传媒对其“可欲的文化”加以编码，但是对文化符号的解码（decoding）却可能是千差万别的。那就是说，文化的支配只能够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因为文化的理解永远是多样性的。此外，同等重要的，作为一种器具，传媒很可能被非主流文化所渗透，为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的表述提供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传媒几乎已成为一个自立的文化领域，但是它的内部依据权力关系被划分为场域（fields）<sup>②</sup>，这些场域与外界的其他场域形成复杂的关系，并在个人的实践中不断地被重构，从而成为难以标准化的文化载体。

## 六、社会人类学思考

几十年来，美国人类学研究采用的关键词是“文化”，而英国人类学者运用“社会”的概念。“文化”一方面指相对于自然的人文体系，另一方面则更常指特定社会的一体化观念—生活方式体系。在社会人类学中，“社会”指的通常是特定的地域性政治实体，其范围可以小到一个近千人的社区（如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特洛布里安德、弗思研究的蒂科比亚、费孝通研究的江村），也可以指整个国家疆域中的整体社会。<sup>③</sup>可见，“文化”和“社会”既可以指一个分析性的概念（analytical concept），也可以指分析的方法论单位（methodological unit）。传统上，出于功能的考虑和方法论的考虑，社会人类学者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他们常关注到，哥伦布以前中美洲玛雅人所用的历法某些现代雅玛村社中仍然在使用，同样地现在许多玛雅人住的房子就类似于他们的祖先在玛雅文明高峰期（公元250—870）所建造的房子。

与世界体系、民族—国家以及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转型，向社会人类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变迁的现实状况，社会人类学者必须承认，尽管稳定是许多文化的显著特征，变迁也确实正在发生。而只要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务必注意到，传统社会人类学把“社会”和“文化”当成完整的自立体系实际上抹杀了他们研究对象的另一面：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上，文化的社会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现状。因此，正如不少人类学者指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者仍然可以关注他们传统上惯于实践的小型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描述（ethnographic descriptions），但他们务必意识到他们所研究小型的社会—文化单位已经是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与此相关地，如果说现代世界体系的主要内容是民族—国家及其文化，那么社会人类学者的调查和描述也就难以避免地要考虑到如何表述这一内容的问题。

### 注 释：

①Ralph Linton, 1936, *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 PP. 325-9

②Edmund Leach, 1954,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London.

③费孝通, 1995,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北京大学学报》, 1995 (2)。

④参见：Andre G. Frank, 1978, *World Accumulation 1492 - 1789*, New York; Immanuel Wallerstein,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⑤Eric Wolf,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California.

⑥殖民主义以前的文化之所以会退化，是因为用于处理传统压力和冲突的传统制度不能对付不适合于传统制度新的急剧变化，或者因为应付这些问题时受到殖民权力的阻碍。

⑦“复兴运动”试图重建一种遭受破坏，但却没有被忘却的生活方式，而“革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内部改造文化的意识体系及其社会结构。

⑧在任何时候，只要理想文化与现实文化全然不同，那么复兴运动都将可能产生。

⑨Peter Worsley, 1957,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London.

⑩Anthony Wallace, 1956,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 256.

⑪Maurice Bloch, 1986, *From Blessing to Violence*, Cambridge.

⑫Philip Kuhn, 1990, *Soulstealers*, Harvard.

⑬Wang Mingming, 1995, "place, administration and territorial cults", *Late Imperial China*, 1995: 2.

⑭Eric Hobsbawm,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⑮Jean Camoroff, 1985,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Chicago.

⑯Anthony Giddens,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Polit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olity.

⑰Ernest Gellner,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⑱详见：Anthony Giddens, 1990,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olity.

⑲Eric wolf,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California, P. 389—390.

⑳M. Paci, 1989, "Long wav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ystems, C. Maier ed., *Changing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Cambridge.

㉑Benedict Anderson,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y*, Verso.

㉒Raymond Williams, 1976, "Communication",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PP. 72—73.

㉓Immanuel Wallerstein,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㉔Benedict Anderson,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Verso.

㉕Stuart Hall,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 Stuart Hall et al, London: Hutchinson, PP. 15—47.

㉖“场域”的概念首先是用来代指学术领域，而 Pierre Bourdieu 认为它们不只是学术领地，而且还是权力划分的社会空间关系，因此可以代指文化领域（cultural sphere）的符号—权力格局。见：Pierre Bourdieu, 1988, *Homo Academicus*, Cambridge: Polity.

㉗Edmund Leach, 1983, *Social Anthropology*, Fontana, PP. 41—2.

【作者简介】王铭铭，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硕士，1992年英国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1993、1994、1995年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伦敦城市大学中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员。已出版译著《当代人类学》、专著《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社区的历程》、《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象征与社会》等论文集，已发表中外文学学术论文40余篇。